

名家选集卷

龚自珍集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名家选集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龚自珍集 / (清) 龚自珍著; 侯荣荣解评.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8.10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名家选集卷)

ISBN 978-7-5457-0011-4

I. 龚… II. ①龚…②侯…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1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7723 号

龚自珍集

著 者: (清) 龚自珍	解 评 者: 侯荣荣
责任编辑: 李永明	审 订 者: 张 强
封面设计: 敬人工作室	版式设计: 敬人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永明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电 话: (0351) 4956036 (咨询) 4922268 (邮购)	
传 真: (0351) 4922102	
网 址: www.sxskcb.com	
邮 编: 030012	
E-mail: fxzx@sxskcb.com	
印刷装订: 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57-0011-4	
定 价: 18.00 元	

智慧之府
 經心之府
 可證之府
 可證之府

九子墨姚莫中
 莫中



· 山西大学教授姚莫中先生为《中国家庭基本藏书》题词

前言

名家选集卷

龚自珍集·前言



“烟新月旧长相从”(《能令公少年行》),这一册《龚自珍集》终于完成了。作为本选集的作者,虽然知道因格登(Roman Ingarden)“作品完成时即作者和作品分手之刻”的理论,但面对读者的检阅,依旧是忐忑不安。

作为晚清最伟大的诗人,龚自珍的文字曾经风靡一时,让一代文士为之折腰。约二百年后,重新阅读龚自珍的诗文,打开书卷,扑面而来的依然是这位逞才任气的诗人在文字中表现出的那种惊人的感染力。可以说,富有力度和激情,又华艳瑰丽的龚氏诗文,有一种席卷人心的力量。

我对龚自珍诗词的迷恋始于本科阶段。2000年5月黄梅雨时节的一次杭州之行,在曲曲折折的江南小巷中手持一份地图,于烟雨蒙蒙中苦苦寻觅马坡巷的龚氏故居小米园。在那个虽一掌可掬却玲珑有致的园内,带着一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刘逸生先生的《龚自珍编年诗注》,我默坐了很久,缅怀着这位天才绝艳的伟大诗人。

七年后,当接到为龚自珍诗词作

一个选注本的任务时，首先浮上心头的，就是绿枝披拂的小米园中那静谧的一个下午。当时的心境，既有能为自己所热爱的诗人作“郑笺”的激动，又深知这份任务的沉重不易。龚诗有魅力而难读，好用古典字眼，好用典故，尤其好用生僻典故如佛藏中语。而这些典故，又多有虽隐晦却强烈的现实指向。是以注古典尚易，注今典实难。而相对于中国诗史上其他重量级诗人来说，古典文学界对于龚自珍诗词文的注释算得上冷落。在龚自珍诗方面，能够加以参考的前人成就，除了刘逸生先生的《龚自珍编年诗注》是诗集全注外，就只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郭延礼选注的《龚自珍诗选》和2006年孙钦善选注的《龚自珍诗词选》这两个选注本。而龚自珍词至今尚无一个全注本出现，可资参考的仅有散落于各种清词选本中的几首龚词而已。

因此，完成本书，最大的难度在于需联系当日社会实际，政坛变幻，加以龚氏的个人经历，来揣摩体味龚氏作诗时的真正心态，从而“破译”龚诗中埋藏的语言密码，展现真正的诗旨。这个过程是荆棘丛生之途上的艰难前行，然而偶有所得，对注释者来说自是最大的愉悦。

在这本小书杀青之际，首先要诚挚地感谢张强教授。到淮阴师范学院任教以后，张先生身教言传，在学业上对我关心爱护良多。在担任张先生的学术助手期间，张先生将《龚自珍集》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我，可以说是张先生促成了这本小书的诞生。张先生对一个初出茅庐的稚嫩学界后辈的种种关心提携和鼓励，令人深深感动。特别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张先生更是从资料搜集，到字句的推敲乃至书写格式的统一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那种严谨的治学风格和薪火相传的精神，让我受益匪浅。同时也要感谢三晋出版社落馥香女士提供的珍贵机会，让我能再次沉溺于奇艳郁勃的龚自珍诗词世界。

为方便读者使用，末附“龚自珍年谱简编”、“龚自珍著作主要版本”、“龚自珍研究主要著作”及“《龚自珍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注）等助读资料四种。

过似秋草芟杂尽，学如春冰积不高。这本小书，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侯荣荣

2008年8月25日

名家选集卷
龚自珍集·代序



龚自珍生平事迹简论（代序）

张
强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将中国带入了近代。从这时起，一个“天朝大国”开始走向沉沦，然而，一个曾用“四大发明”改变世界进程的民族怎能自甘落伍呢？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龚自珍率先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一百二十五）的呐喊。这一呐喊集中体现了一代先行者对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放眼世界，当我们赞赏那些抵御洋枪大炮的英雄时，同时也要记住那些发现危机的思想先行者。客观地讲，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龚自珍（1792—1841），乳名阿珍，初名自邳，又名自珍，初字尔玉；后更名易简、巩祚，又字璚人、伯定；自号定盦，又号羽琇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龚自珍出生于杭州望族，父亲龚丽正为嘉庆元年（1796）进士，曾任京官，后任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龚丽正是龚禔身的次子，龚禔身为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龚禔身与龚敬身为同胞兄弟，因龚敬身无后，龚丽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遂过继给龚敬身。龚敬身是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进士,早年任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后出知云南楚雄府,在地方上极有政声。此外,龚自珍的叔父龚守正为清嘉庆七年(1802)的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不难想象,出生在这样的官宦家庭,龚自珍自幼接受的教育自然是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进而言之,在这样的环境熏陶和影响下,龚自珍在苦读与参加科举的同时,有机会接触到朝野内外不同的人物。如嘉庆十九年(1814),龚丽正任徽州知府时主持重修《徽州府志》,23岁的龚自珍参与到徽州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中,其间,与徽州的官宦及社会贤达名流多有交往。道光二年(1822),31岁的龚自珍应会试落第后,与著名的文士魏源、包世臣、何绍基等交游,并参加了陈沆设立的五簋会。道光三年(1823),龚自珍赴京参加会试,因叔父龚守正任会试同考官,避嫌未试,于是与谢阶树、陈沆等交游,并与在京的名士举行诗会,一同纪念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的生日。交往中,龚自珍与一批饱学之士或切磋学问,或关注现实,或关注时代风云的变化。这些都对龚自珍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也许是老天爷太看重龚自珍了,赐给他一个令人羡慕的读书环境和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家庭。具体地讲,祖父龚敬身著有《桂隐山房遗稿》,生祖父龚昉身著有《吟厓山房诗》。父亲龚丽正是著名的学者,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著作;母亲段驯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的女儿,知书达礼,著有《绿华吟榭诗草》等。龚自珍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如8岁时,龚丽正曾亲自教龚自珍读《登科录》和《昭明文选》。又如,吴伟业的诗歌、方舟的文章是举子们追捧的对象。当许多蒙童还搞不清楚吴伟业、方舟在文坛上的地位时,龚自珍已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三别好诗序》)。通过阅读,年仅10岁的龚自珍已能从事诗歌的写作,并与其母唱和。更重要的是,龚自珍在少年时代还接受了外公段玉裁的严格训练。段玉裁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精通经史子集,著有《段注说文解字》。不过,如果仅仅把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说成是小学,那将是天大的错误。乾嘉学派的最大功绩是以考据、训诂等为手段,在反对程朱理学的过程中,主张恢复汉代经学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段玉裁曾语重心长地对龚自珍说:“勿读无益之书,勿作无用之文……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经韵楼集·与外孙龚自珍札》)在段玉裁的亲自教导下,龚自珍对经学为经世致用之学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因为这样的缘故,28岁的龚自珍拜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为师,开始了研习《公羊春秋》学的历程。



刘逢禄是一代大儒,在《公羊春秋》学方面极有心得。以师从刘逢禄为转折点,龚自珍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在《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六中写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刘逢禄的教诲使龚自珍如沐春风。在这中间,龚自珍为得到《公羊春秋》学的真谛而欣喜若狂,并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这一学问之中。“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在这两句诗中,龚自珍通过反省,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否定。也就是说,通过师从刘逢禄,《公羊春秋》学开始成为龚自珍批判现实、主张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经学发展到宋代,在理学家程朱(程颢、程颐、朱熹)的倡导下,以“心性”阐释经学,提倡“格物致知”,使经学堕入了理学化的泥潭,进而成为束缚思想的缰绳。质言之,程朱理学对经学的反动,使经学丧失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乾嘉以后,一批经学家以恢复汉代经学传统为己任,对程朱理学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乾嘉学派批判程朱理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对将经学僵死化的做法,是为了重新确认六经为先王政典、为统治大法的思想。通过师从刘逢禄,龚自珍确立了经学为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并且完全把思想立场移到了《公羊春秋》学方面。这一时期,龚自珍把研习《公羊春秋》学时获取的心得贯穿到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并运用《公羊春秋》学的思想精髓来解决现实问题。如针对西方列强不断地侵扰西北边疆,龚自珍写下了《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以此来探讨解除西北边疆免受列强侵扰的途径。又如为了维护六经思想精髓的崇高性,龚自珍写下了《五经大义终始答问》、《春秋决事比答问》等著作,针锋相对地从理论上和现实中批驳抱残守缺的腐儒。追溯龚自珍思想变化的轨迹,应该说,是段玉裁给龚自珍灌输了经学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刘逢禄为龚自珍思想发生重大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是《公羊春秋》学给龚自珍提供了要求变革的思想宝库。

从另一个层面看,当龚自珍痴迷于《公羊春秋》学的时候,他对《公羊春秋》刻意宣扬谶纬灾异的做法又是有微辞的。如针对汉代经学家提出的《春秋》“决狱”说,他将其放大为“决事”,至于如何“决事”,他通过引援古事论述现实政治取法于《公羊春秋》学的重要性。他指出:“《春秋》当兴王,假立是吏而作。今律,有部议,有部拟,有阁臣票双签、票三签,有恩旨缓决,皆本《春秋》立文者也;先原奏,后旨意,两者具,然后狱具。作者曰:是亦吾所为测《春秋》也。”(《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一》,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结合《春秋决事比答问》系列文章的中心观点来考察“测《春秋》”一语的含义,应该说,龚自珍所关心

中国家庭藏书

的《公羊春秋》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是坚决反对以讖纬灾异附会《公羊春秋》的。进而言之，经过龚自珍的阐释，《公羊春秋》不但被还原成一部有着丰富思想的历史著作，而且寓于其中的历史观还成了龚自珍批判现实、为现实服务的思想武器。

岁月蹉跎，嘉庆十八年（1813）八月，22岁的龚自珍经历丧妻之痛苦后参加顺天府乡试，不料落第南归。经过一番准备，嘉庆二十三年（1818），龚自珍参加浙江乡试，一举高中，名列第四。或许是人生必须经受历练，从乡试中举的次年起，龚自珍连续五次会试落榜，甚至在道光元年（1821）夏天以内阁中书应考军机章京也铩羽而归。这一盆盆的冷水泼来，并没有让龚自珍心灰意冷，相反，为了实现鸿鹄之志，龚自珍屡败屡战，终于在38岁（道光九年，1829年）的时候考取了进士。金榜题名后，龚自珍非常渴望进入梦寐以求的翰林院供职。遗憾的是，因“书法不合楷法”，龚自珍与此失之交臂。此时，龚自珍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留在京城，等待机会；一是放外任，担任知县。经过一番思考，龚自珍做出了呈请留京的决定。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的十年京官生涯中，从内阁中书到任宗人府主事，再到任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龚自珍始终没有得到重用。或许是心灰意冷，龚自珍决定辞官南归。不料，两年后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竟暴卒于丹阳，从此结束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京十年既是岁月蹉跎的十年，同时也是龚自珍关心国事的十年。在这十年中，龚自珍放眼世界，对日益临近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充满了忧虑。如道光十二年（1832），龚自珍上书朝廷，作《当世急务八条》。又如道光十八年（1838），龚自珍上书礼部堂官，论四司政体沿革。

鸦片战争的前夕是中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的时刻。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由深层浮到表层，直接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兼并事件屡屡发生，不但消解了康乾以来的繁荣，而且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导火线。与此同时，统治者顽固地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盲目自大中失去了与世界各国及不同民族同步发展的机会。当西方列强在航海技术的支持下来到中国时，举朝上下的傲慢代替了科学和知识。在满族最高统治者的眼里，“天朝”作为世界的中心，只能接受四方的朝贡。“夷人”来到中国，只能向“天朝”行跪拜礼，只能接受“天朝”的恩惠。然而，满清王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无知与傲慢迭加在一起，只能给民族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当满族统治者以“天朝”自居时，觊觎中国已久的西方列强终于发现麒麟皮下的马脚，他们不再把威严的“天朝”放在眼里，决定给色厉内荏的“天朝”以致命的打击。为了打破贸易上的



逆差,为了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残中华民族,西方列强采取卑劣的手段,疯狂地进行鸦片贸易。没有想到的是,一些王公大臣为了中饱私囊反而与西方的鸦片走私贩子勾结在一起,干起毒害中华民族的勾当。在这一紧要的关口,即当满族最高统治者还在醉生梦死的时候,龚自珍已敏锐地发现了西方列强以鸦片贸易进行经济掠夺以及白银大量外流的严峻现实。面对日益加重的危机,龚自珍从经学入手,提出了挽救社会危机的方案。为此,他于道光十三年(1833)作《古史钩沉论》、《六经正名》、《六经正名答问》等,又作《左氏春秋服杜补义》一卷、《左氏决疣》一卷等。道光十四年(1834)作《干禄新书》。道光十八年又编成《春秋决事比答问》六卷,文集百卷。这些著作在反映龚自珍的改革思想的同时,也展示了龚自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此时,一向不愿放外任的龚自珍曾表示愿意随同林则徐前往广东,遗憾的是,因林则徐派人劝阻,龚自珍未能成行。尽管如此,这件事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龚自珍对鸦片贸易带来的民族危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当满族统治者及大多数的士人还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恶果时,甚至还在醉生梦死中大唱歌舞升平的赞歌时,龚自珍已深刻地认识到这场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因无法遏制内心的痛苦,他心情沉重地写下了“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十二)等诗句。许多年后,梁启超感慨万千地写道:“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指龚自珍、魏源等)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4页)从这些事例中都可以看到龚自珍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都可以看到他站在时代前列的形象。

龚自珍是近代中国主张改革的先行者,其改革方案是在西方列强节节进逼、满清王朝日趋腐败的现实中提出来的。当然,这一改革方案带有先天上的不足。具体地讲,一是龚自珍接受的教育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这一教育体系的基础是“修齐治平”,其核心价值取向是入仕进取。这样一来,龚自珍倡导的改革只能具有“补天”的性质,只能是改良,不可能从根本上发现社会矛盾的痼疾,进而针对这一痼疾提出变革方案。二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以至于自然经济体系成为因袭的重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用科学的知识看待山川万物。再加上近代航海技术发明以前,因缺少世界地理概念,以至于长期生

活在中国这一区域的社会成员一直把中国视为世界地理的中心，一直以先进文化的代表自居，这样一来，盲目的自大导致了中国无法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平等地交流。三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经济体系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阻力，与此同时，科举制度轻视科学技术的导向也成为阻碍重视科学的因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无法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埋下了伏线。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龚自珍的改革思想只能以传统文化为本位，以经学为本位，或者是向传统文化回归。所以连龚自珍自己也说：“岂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其四十四）尽管如此，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毕竟是龚自珍率先提出了改革。在这一过程中，试图以改革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则使得龚自珍成为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

遗憾的是，龚自珍只是从经学中寻求医治中国的药方，没能在研究西方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变革的方案。当时，龚自珍完全有了解西方社会的条件。如在西方列强的进逼下，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页）的主张。魏源是龚自珍的密友，两人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多有交流和切磋。然而，尽管龚自珍十分关注西方社会的现状和历史，但其变革思想的提出却与西方无关。具体地讲，龚自珍鼓吹的社会变革思想是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易传·系辞下》）为逻辑起点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表明在经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龚自珍不可能抛弃长期以来形成的知识结构；二是表明龚自珍是《公羊春秋》学即经世致用之学的自觉维护者；三是不以西学为变革的理论而是从经学中寻找依据，表明龚自珍是在比较中西文化优长的基础上，经过思考独自得出的结论。当然，我们可以说龚自珍的思想保守，是一个固守文化传统的改良主义者，但绝不能说龚自珍没有面对西方列强先进科学技术的勇气和眼光。

在欧洲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但丁占有重要的一席。一代伟人恩格斯曾用“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共产党宣言·序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一语来赞扬但丁。其实，把这句话移到龚自珍的身上也同样准确。放眼中国文坛，龚自珍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的第一位诗人。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古代文学画上了句号，如果我们找一位最接近这一时间断限的诗人，似乎只有龚自珍了。在这一终结期，尽管文坛上有一批诗人，可是有谁能像龚自珍那样自铸伟词饱蘸着思想情感以天下为己任呢？又有谁在诗文创作中始终如一地关注时代风云的变幻呢？



国家不幸诗人幸，时代把龚自珍放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口，让他承担起承前启后的重任。当他的生命延续到鸦片战争的次年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又将他的视野引向了“振兴中华”的方面。

龚自珍的诗文涉及许多方面。早年，富有才学和阅历不深的龚自珍自视甚高，颇有狂放孤傲之风。是时，虽有佳作，但大都锋芒毕露，实为抒写书生意气之作。这一时期，著名的诗篇有《行路易》、《呜呜磴磴》等。稍后，京城十年冷署闲曹、久沉下僚的生活，使龚自珍与官场产生巨大的矛盾。在这中间，对官场深刻的洞察与内心世界的苦闷交织在一起，使龚自珍的诗文创作在批判现实中激荡着一股怨愤之气。从其创作的情况可以看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龚自珍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原动力。受这种原动力的支配，其诗文创作始以抒写不平之气为主旋律。具体地讲，《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西郊落花歌》、《送南归者》等，堪称这一方面的佳作。《送南归者》云：“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且买青山且酹卧，料无富贵逼人来。”诗人在抒写送友人南归之情时，又暗写了自己的失落情怀和愤懑之情。在抒写情怀时，龚自珍有意识地渲染了失落和心地苍凉的艺术氛围，成功地塑造了“城南有客夜兀兀，不风尚且凄心神”（《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的自我形象。读其作品，可谓是令人心神摇曳。

道光十九年（1839），厌倦官场的龚自珍辞官南下，行程中写下了震古铄今的组诗《己亥杂诗》。《己亥杂诗》由315首七言绝句构成，组诗处处留下龚自珍个人的生活印记和身世飘零的身影，完全可以视为龚自珍个人的人生总结。组诗从辞官南归的当天四月二十三日写起，一直写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昆山，即龚自珍将眷属安顿到昆山别墅羽琨山馆为止。从表面上看，《己亥杂诗》是一组纪行诗，它从离京之日写起，一路信笔写来，似为遵循传统之作。然而，仅有这样的认识将大错特错。这一组诗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诗人走过的人生道路，完整地描述了诗人关心国事的思想历程。在这一组诗中，龚自珍通过纪行将平生所遇所思所学任意点染，或写人生际遇，或写得意时的快感，或写失意时的困顿，或写艳情，或写情思，或写寄托，或写考订金石，或写甄别学术源流等。除此之外，在组诗中龚自珍还有意识地打破绝句固有的书写格式，从艺术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可贵的尝试。如他有意识地以古字奥典入诗，以佛经话语为诗，甚至还故意地重复用韵。通过这一探索，《己亥杂诗》不但成为无所不包、前无古人的绝唱，而且还成了体制宏大的中国古代诗歌的压卷之作和龚自珍自己的扛鼎之作。

前人在论述龚自珍文学成就时有许多精辟的观点。如鲍正鹄先生指出：“龚自珍文学作品的独创性也表现在形式与技巧上。他的作品冲破和摆脱了当时流行的艺术戒律。……在他的散文（包括政论）写作上，有着曲而中，肆而隐的表达方法和辞文旨远的特色，由于清朝封建专制积威的影响，他无从把许多不欲明言、不忍卒言的内容明白晓畅地说出来，于是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精巧的‘暗示’手法……龚自珍的诗歌能使人‘闻是声也，忽然而起，非乐非怨，上九天，下九渊，将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长短言自序》）。其奥秘是它的巨大的抒情力量（所谓抒情，无非是指一个激动了的心灵的呼唤。但跳跟叫啸决不能达到抒情的要求）。龚自珍的诗歌善于塑造完整而鲜明的形象吸引读者分享他的感受。他善于用比兴的手法来表达他的窈窕要眇之思。他又善于用不同的体裁、句法、韵律来表达不同的内容与感情，说服读者，感染读者。”（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8页）其实，龚自珍的文学成就远不止这些，为此，有必要再作一些补充。

其一，龚自珍的文学创作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直抒胸臆，一是曲折己意。所谓直抒胸臆，是指龚自珍在文学创作时常常以不吐不快的形式，将激情倾诉于笔端，造成一种磅礴的气势，以震耳欲聋之势感染读者。如脍炙人口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其一百二十五），就是典型的直抒胸臆之作。曲折己意是指龚自珍因为迫于外部的压力，只能采用含蓄的手法来传达复杂的情感，只能借助于诗歌来排遣愤懑的心情。他写道：“一天幽怨欲谁谙？词客如云气正酣。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吴山人文征、沈书记锡东钱之虎丘》）在这里，“箫心”成为了龚自珍传达复杂情感的载体。

其二，龚自珍善于捕捉不同的意象或物象来表达高远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在这一过程中，经过诗人的反复皴染，一些看似平常的物象往往生发出象征性的意义。如在诗歌创作中，龚自珍特意强调了入仕进取精神的“剑气”和不甘寂寞及冷遇的“箫心”这两个意象。如他在《纪梦》其五中写道：“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在《漫感》中写道：“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志，负尽狂名十五年。”在《秋心三首》其一中写道：“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在《己亥杂诗》其九十六中写道：“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很显然，“剑气”抒写了诗人的理想和豪情；“箫心”抒写了诗人的幽愤和怨怼。通过诗人的刻意渲染，“剑气”与“箫心”具有了象征性。在



这一过程中,通过龚自珍的对举,“剑气”与“箫心”又具有互文的品质。剑与箫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器物,一向是士人表达人生志向和宣泄情感的凭借物。在“修齐治平”的指引下,剑与箫作为士人手中的器物,往往与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雄心壮志联系在一起。然而,当满清王朝已经到达病入膏肓的境地时,对于个体来说,即便是有惊世骇俗的才干、手中有最为精良的武器,又有什么用呢?又怎能有回天之力呢?所以,龚自珍只能用“剑气”和“箫心”来抒写不平之气和怨愤之情了。从另一个层面看,当“剑气”与“箫心”等意象反复出现时,它所传达的艺术情境无疑为创造龚诗“声情沉烈,恻怛遒上”(《己亥杂诗》末程金凤女士跋)的艺术风格添上了精彩的一笔。

其三,龚自珍的诗词文有追求奇崛的特点,其摄物取象往往给人以新奇之感。《病梅馆记》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在这一传颂千古的散文名篇中,龚自珍先叙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倚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审美标准,随即宕开一笔,将符合这一审美标准的梅花盆景称之为“病梅”。为了追究“病梅”产生的根源,龚自珍刨根问底地将“病梅”的产生与“文人画士”的喜爱联系在一起,由此层层剥笋,揭露出是文人画士的“孤癖之隐”才倡导了以“病梅”为美的世风。在这一过程中,经过作家的反复强调,“文人画士”与“病梅”之间的联系遂具有了普遍性的象征意义,进而承担起龚自珍控诉病态社会对人性的束缚与迫害的真实意图。此外,在诗歌创作中,龚自珍还善于用豪壮语写伤感绮靡的情思。如辞官南归时,龚自珍写下了“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其五)。一般来说,诗人抒写离愁时大都将其写得缠绵悱恻,但龚自珍别出心裁,以“浩荡”二字领起,从而使诗歌具有了奇崛的特点。又如他的词作在抒写细腻缠绵的情爱时,亦有奇崛的风格和别样的寄托。其词或直入求之不得的失落情怀,或表现忧生叹世的情绪。如他在《端正好》一词中写道:

数年华闲中黯黯,记不起谁恩谁怨。金炉香袅昼沉沉,并叠作,闲愁片。月明花满天如愿,也终有酒阑灯散。不如被冷更香销,独自去,思千遍。

从“闲中”二字中可知这是一首别有寄托的词,是在倾吐诗人失意的情怀。当我们把“闲愁”片片与“思千遍”联系在一起时,从中自可见诗人因失意于政治带来的不平静,亦可见诗人比喻之奇。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其四，龚自珍的诗歌给刻意模仿晚唐、推崇宋诗的晚清诗坛吹进了一股清风。当众人以模仿晚唐、推崇宋诗为荣时，龚自珍能全面地吸收中国古代文学的营养，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龚自珍有“读罢一时才子句，骚香汉艳各精神”（《题红蕙花诗册尾》）、“《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秋心三首》其二）、“贾谊长沙谪未还，江东文酒绪阑珊。论文膳有何无忌，指点吾徒梦里山”（《程秋樵江楼听雨卷，周保绪画》）、“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己亥杂诗》其一百二十九）等诗句，从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中可以看到，龚自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他广泛地吸收中国古代文学的营养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中间，庄骚对龚自珍的影响尤其巨大。“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三），龚自珍把庄子奇特的想象和屈原奇幻飘逸的风格铸入诗歌创作中，把庄子、屈原的浪漫的艺术风格融入到创作中，既为其反叛清诗传统的格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充满激情的浪漫诗风注入了灵魂。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3页）龚自珍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尊崇的对象，是因为他开创的一代文学，将完美的艺术追求与深厚的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而对旧世界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启蒙主义的思想要求。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为晚清人士尊崇的对象，乃至于鼓吹“诗界革命”的黄遵宪、主张维新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从不同的方面接受了龚自珍的遗产。从这一意义上讲，龚自珍开创的一代诗风，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前瞻性直接干预了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坛。

龚自珍文集及诗词集的版本十分丰富。其中，重要的版本有，道光三年（1823）龚自珍自刻《定盦文集》三卷、《馀集》一卷、附《少作》一卷。道光二十年（1840）龚自珍自刻《己亥杂诗》一卷。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友人魏源辑《定盦文录》十二卷，又编考证、杂著、诗词十二卷，无刻本。同治七年（1868），吴煦刻《定盦文集》三卷，《定盦续集》四卷，《定盦文集补》九卷。清光绪十二年（1886），朱之榛刻《定盦文集补编》四卷。其后，《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据吴氏、朱氏刻本编订。在此基础上，又有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按，《国学基本丛书》本另辑有《定盦文集佚文》一卷）目前，最为完备的版本当推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龚自珍全集》，该版本由王佩



诤校,1999年在旧版的基础上挖补形成新的《龚自珍全集》本。该本共十一辑,第一至第八辑为文,第九、十两辑为诗,第十一辑为词,后附一定数量的龚自珍研究资料。

近年来,研究龚自珍的主要著作分别有:管林等《龚自珍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郭延礼《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孙文光等《龚自珍研究论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陈铭《龚自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主要的选注本有:刘逸生《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郭延礼《龚自珍诗选》,齐鲁书社1981年版;刘逸生等《龚自珍编年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孙钦善《龚自珍诗词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可以预计,随着清代文学研究的升温,必将会有更多更优秀的龚自珍研究著作问世。

张强,1956年生,江苏沛阳人。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中国文学年鉴》编委,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秦文化原论》等十余种,发表论文150余篇。